



HAL
open science

中国境内甘肃青海一带的语言区域

Dan Xu, Alain Peyraube

► **To cite this version:**

| Dan Xu, Alain Peyraube. 中国境内甘肃青海一带的语言区域. hanyu xuebao, 2018. <hal-01888034>

HAL Id: hal-01888034

<https://inalco.hal.science/hal-01888034>

Submitted on 4 Oct 2018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中国境内甘肃青海一带的语言区域

徐 丹 贝罗贝

提 要 语言区域的概念随着语言接触的研究而进入人们的视野。世界上许多语言区域都很著名。中国境内甘肃青海一带的语言区域较少得到关注,原因之一是这一带历史悠久,人群来源复杂,语言涉及多个语族、语系。本文力图介绍分析甘肃青海一带语言区域共享的句法特征及形成的历史层次。通过语言事实我们看到,甘肃青海一带的语言区域业已形成,区域内汉语方言和汉语变体均向非汉语的句法表现形式靠拢。汉语在词汇上对区域内其他非汉语有影响,但非汉语在句法上对当地汉语及汉语变体的影响却更深刻而不可逆转。

关键词 语言区域 语言接触 句法特征 历史层次

一 引言

语言研究的方法论一直伴随语言学的发展走到今天。早在 19 世纪印欧语言对比研究的初期, Schleicher(1821~1868)就建立了最早的语言谱系树,这和达尔文(1809~1882)进化论中建立人类谱系的想法不谋而合。达尔文当时预计,如果人类谱系建立得完美,将为世界语言分类提供一个可靠的参考。后来 Schmidt(1843~1901)察觉到谱系树不能全面反映语言可以横向交流的事实,建立了波浪理论。学者们认识到,这两种方法互补,都不失为有效的研究方法。后来波浪理论在语言学领域并未真正付诸实践,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分子人类学蓬勃发展以来,生物学家利用树形和网状两种模式研究生物,语言学家也开始并重这两种模式,因为两种研究模式互补,可以对各语系语言的演变做出纵向和横向的描述。比较语言学始于印欧语系的研究,现已扩展到各个语系甚至超大语系。语系的分类,句法的演变,同源词的研究,一直方兴未艾。

语言类型(Greenberg 等 1963)研究,从 60 年代以来就成为语言学家们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后又辅以计算机语言学等可以量化的分析方法(如 Dryer 1992; Starostin 2000; Wichmann & Holman 2009; Pagel et al 2013; Greenhill 2017 等),发展到今天的大数据研究,都反映出语言学领域宏观研究发展的足迹。语言类型的研究方法和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都是互补互益的。总体来讲,语言内部的演变规律和机制一直很受语言学家重视,可说是主流研究。直到越来越多的语言工作者开始研究语言接触,即语言演变的外部机制,语言区域和区域语言学才开始受到重视、走进人们的视野。Weinreich (1953) 50 年代就开始了语言接触的研究,其博士论文至今仍是经典论著。80 年代后,以 Thomason 和 Kauffman (1988) 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系统地、大面积地研究世界范围内的语言接触现象。近年来,关于语言区域和

区域语言的研究越来越普遍。语言区域/区域语言的话题也越来越多地被各种论著涉及。

其实这些讨论的背景,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在印欧语言谱系树研究方法成为主流方法时,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带来了一股新鲜潮流,当语言谱系和类型学的研究在某些地区不易说明语言变化时,语言接触的理论方法就被挖掘利用。语言演变的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同样重要,因为语言从来都不是在真空条件下生存的,社会因素不可忽视。关于语言区域/区域语言学的讨论一直存在,尤其是2000年后,一批有关语言区域和语言传播方式的文章及著作很具影响力。如 Aikhenvald (2001)、Thomason (2001)、Aikhenvald 和 Dixon(1998)、Enfield (2005)、Campbell (2006),等等。在 Thomason 和 Kaufman(1988)的合著里,有关“语言联盟”(Sprachbund)的论述只有三页,但在后来 Thomason (2001)的著作里,她再次讨论语言接触时,“语言区域”占了整整一章(29页)。这反映了当时“语言区域”研究的热烈讨论。时至今日,语言学界认识到,语言谱系和语言接触或区域语言学是两种互补的研究方法,是不能互代的。中国学者吴安其(2004:1)也曾指出:“语言联盟这样的归纳不能代替发生学分类。”

二 语言区域和区域语言学

讨论语言接触或区域语言学,当然会涉及语言区域的定义。Campbell (2006)对语言区域有很详细的综述和评价。他指出,是 Trubetzkoy(1928:18)首次提出 Sprachbund 这个概念的。而 linguistic area 这个英语词来自 Velten (1943)对 Sprachbund 一词的翻译,后又由于 Emeneau (1965)的研究传播开来(见 Campbell 2006:3)。同一作者把历史上几乎所有有关语言联盟、语言区域的定义逐条列出并注明出处、页数,方便了其他学者的回顾研究。语言区域的定义是什么?Campbell (2006)几乎给出了“语言区域”的定义大全^①。他把各家的术语、定义、关键词、文章或著作里出现的页数都一一列出。从18世纪到现代的研究,他都全面地做了介绍。由于这方面的历史资料时间跨度大、令人目不暇给,所以他的综述很有提纲挈领的功效。此处我们无意再次做个综述,只是把和我们的研究相关的部分拿出来讨论。其余部分读者可以参考 Campbell (2006)、吴福祥(2017)的文章和综述。

综合前人观点,我们认为语言区域指在某一地理范围内,属于不同语族(或语系)的语言由于长期接触,开始共享一些句法特征。言外之意,这些语法特征在该语言区域内的某些语言里历史上根本不存在。语言学家对语言区域的定义在细节上争论颇多,集中在以下几点:1)语言数量:一个区域内最少应有几种语言?2)语系数量:多少语系数量才能称得上语言区域?3)特征数量:共享特征应该有多少?4)语言区域的边界和范围。5)怎么界定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具有反思意义的是,Campbell (2006:2)指出:“试图界定这一概念已经浪费了太多的精力,而取得的进展甚微,若多调查语言扩散的事实而不关心定义语言区域则会更有成效。”我们完全同意这一观点。前人讨论的这些“问题”,每个学者都是见仁见智,无法统一。因为各语言区域的状况都不相同,况且语言不是数学,无法把一个社会现象定义得很精准。正如 Thomason (2001:115)指出的:“总之,从社会层面到语言层面,‘语言区域都不是一个齐整划一的现象。”这使我们想起70年代关于汉语是VO类型的语言还是OV类型的语言那场讨论。Peyraube (1996)指出,与其争论不休,不如多做语言事实的描写研究语言。

世界上的语言区域很多,最有名的是巴尔干地区的语言区域。关于世界各语言区域,请参考 Comrie (1981:204—210)与 Thomason (2001)的有关论述,这些学者介绍了巴尔干语言区

域(the Balkan)、波罗的海语言区域(the Baltic)、埃塞俄比亚高地语言区域(the Ethiopian highlands)、南亚语言区域(South Asia)、新几内亚塞皮克河流域地区(the Sepik River basin, New Guinea)和北美太平洋西北部地区(the Pacific Northwest of North America)等语言区域。可以说,基本全面概括介绍了以前学者们的研究,详尽地综述了已知的语言区域。中国甘肃青海(以下简称“甘青”)一带的语言区域不在其中,而且鲜为人知,这是因为甘青一带语言区域的研究是近三十年的事情,历史相对较短,加上普通语言学的学者不一定都了解中国境内汉语及非汉语接触的状况。这还要靠我们把自己调查研究的成果向世界同行介绍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境内的语言区域及研究。当然中国境内还有其他语言区域存在。我们这篇文章的目的只限于介绍分析中国甘青一带的语言区域。

三 甘青一带语言区域现况

法国学者梅耶(Antoine Meillet, 1866~1936)和美国学者萨丕尔(Edward Sapir, 1884~1939)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语言学家。他们都曾指出,语法范畴不是不能借贷,但是较少。现代的语言学者通过实际调查和搜集的资料,一致认为,语法范畴如同其他范畴一样是容易借贷的(见 Thomason and Kaufman 1988),而语言区域的要素就是某些句法特征趋同。可见句法特征是通过语言接触而传播的,使原来没有这些句法特征的语言开始有了新的句法特征。

对甘青一带语言特殊状况的描述,19世纪已有西方冒险家、学者、宗教人士注意到,并对这一带的某些语言进行过描写,详见钟进文(2007)、Nugteren 和 Roos (2006)、Janhunen (2007)等学者的介绍和综述。1995年,Dwyer曾把中国西北地区叫作语言区域。她没有具体说明区域范围,谈到的西北方言包括新疆乌鲁木齐、宁夏、陕西、山西及内蒙古西部部分地区的北方汉语。她的文章分析了循化话^②的特点,并提供了124个句子的语料。Nugteren 和 Roos (2006:101)在分析西部裕固语时也曾提到“甘肃——青海语言区域”。Slater (2003:7)提出“青海—甘肃语言区域”的概念,他认为区域形成时间大约不会早于13世纪中叶。他的著作对土语进行了描写和分析。Janhunen (2006)曾提出“安多语言区域”的概念,因为这些语言主要集中在讲安多藏语的地区,如青海海东和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他在(2007)、(2012)的文章里,仍用“安多语言区域”(Amdo Sprachbund),但明确说明就是Slater (2003)提出的青海—甘肃语言区域。Janhunen(2012:177)认为区域形成时期大约是公元后500至1500年左右,区域范围包括青海海东地区和甘肃甘南地区。他定义的区域里还包括兰州方言,这点我们觉得不够妥当。兰州方言至今都是动宾(VO)语序,而且没有格标记。宾动(OV)语序和有格标记是甘青语言区域最根本的特征,所以,我们把兰州方言排除在外。我们初步认为,区域形成的上限难以界定,因为这个区域一直是各种人群接触、通婚、贸易的地方。有明确历史记载层次的界限应该是在13世纪左右,即以蒙古族开始统治中原为准,目前所见的甘青语言区域开始形成的时间应该在14世纪以后,因为按照有案可稽的历史材料看,时间不会早于这些新融生的群体到来之前。我们已经知道,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这几个群体的主体大约是14~16世纪从中亚、西亚移民而来的(半一之1981;周伟洲2003;徐丹2014)。在这些新的群体形成之前,吐蕃唃廝囉家族曾在这里称雄(齐德舜2010)。鉴于上述历史事实,我们认为现有的语言区域的形成大概是从14世纪开始的。徐丹(2014,2015,2018),Peyraube (2017,2018)曾讨论过甘青一带的语言区域。本文试图进一步讨论这个语言区域,并加入新的材料细化讨论内容。

3.1 区域范围

前文谈到学者们对甘青一带的语言区域定义不一,有的没有给出明确范围,有的略显过宽。我们已经说明了为何不同意把兰州方言放在语言区域里面。兰州话语序仍保持VO,没有格标记系统,声调仍保留四个,除复数标记特征和语言区域一致外,其他一些主要区域特征均不见于兰州方言。下文会详细讨论这些特征。我们这里的语言区域指甘肃青海交界的一带区域。具体说,相当于青海海东藏族自治州(南到同仁县)加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这一带地方。甘南紧邻青海同仁和甘肃临夏的夏河话也包括在内,但由于语言材料太少(中岛幹起1992),暂不论及。其他未讨论的地区不一定不符合语言区域标准,但是掌握的材料有限,故暂时不论。本文将限于介绍比较中心(甘青交界地区)的地带。在这一区域内有如下语言:蒙古语族的东乡话、保安话、土族语、康家话、东部裕固语;汉语方言的临夏话、循化话和青海话(包括西宁话)及汉语变体^⑤的唐汪话、甘沟话和五屯话;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安多藏语,突厥语族的撒拉语、西部裕固语。显然,这个地区族群复杂,移民历史悠久,语言接触频繁,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佛教和伊斯兰教、汉语和非汉语、汉民族和少数民族几百年来一直在这片高原和平原交界区共生、共存。多元化是这个地区的特点。我们将主要讨论语言区域内的部分语言^⑥。

3.2 共享特征

这一语言区域共享许多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特征都共享。这里说的特征,特指语法结构上的特征,而不是语音或词汇方面的特征。这一地区的非汉语借了大批汉语词汇,但句法上基本保持了原有特点。而汉语方言则相反,词汇保留基本完好或大部分保留得较好,但句法上借了邻近语言的特点,以至于影响到了汉语句法的根基^⑦。有时某些汉语方言更多地吸取了蒙古语族语言的特点,有时某些语言的特征来自安多藏语,有时候来自突厥语,比如临夏话和循化话里的指示代词“兀”(那),这是从突厥语族撒拉语里“u”(那)借来的。我们将对部分共享特征分别加以说明,有些在过去文章已经谈过的特征从简,过去谈得较少或没谈到的特征尽量给出例句,最后附总表概括。由于篇幅关系,例子有所选择,来源会随文说明。

这个地区的部分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如安多藏语和汉语各方言),有的属于阿尔泰语^⑧类型的语言,还有的已经开始脱离汉语原有的类型,我们称其为“汉语变体”,如唐汪话、甘沟话和五屯话。这里的非汉语语言都没有声调,如安多藏语、东乡话、保安话、土族语、撒拉语等。安多藏语和其他语言暂时被认定没有同源关系,但这些语言共享一些句法特征,如语序都是OV形式,“说”动词后置于句子后面,都有格标记系统,除撒拉语外,格标记中都是与格和位格同形式,除了土族语外都有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区别,撒拉语用动词词干的后加成分表示包括和排除意义,其他语言都用代词第一人称复数不同形式表示。这些语言都用动词“有”表达“在”,表达“占有”意义时都用句式“NP(名词词组)+与格+有”表示。甘青一带的汉语及汉语变体,除了与藏语在5000甚至6000年前被认为是同源外,显然与上述其他语言不同源。而如此不同的语言,共享诸多句法特征,表明这个语言区域形成的时间已有一定的深度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语言区域反映出来的是一个近期的层次。历史上这个区域几度被不同的族群或群体控制,所以历史上可能有更深、更古老的区域。这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初见端倪。目前已经看到,共同的语言特征远远不止一两个。所以像Thomason(2001:101)提出的,只需一个语言特征就能判定语言区域,在理论上是对的,但在现实中恐怕很难找到。汉语和非汉语如此趋同,这就很值得研究。这些语言对汉语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或者说汉语方言不同程度地吸收了这些邻近的非汉语的句法形式。下面我们重点比较几个非汉语和汉语的语言区域

特征。

3.2.1 语序类型

这一区域内非汉语语序都是宾动(OV)而不是动宾(VO)。汉语及汉语变体情况不一致,有的VO语序犹存,如临夏话、循化话、唐汪话和青海(西宁)话。五屯话和甘沟话的语料太少,暂时存疑。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哪个有VO语序的方言,记录这种语序的作者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尽管存在VO语序,但OV才是占优势的语序。有的材料全篇只有一个例子是VO语序,但作者没有做出说明,我们给出出处,供读者参考:

(1)临夏话

a. OV 语序:我他哈叫来了我把他叫来了。(王森 1993:192)

b. VO 语序:老师有十分的本事时,这十分本事就全都要教给你们呢。(王森 1993:191)

(2)循化话

a. OV 语序:我(ŋə)钱遗过了我把钱丢了。(尹龙 1985:108)

b. VO 语序:老王他最最喜欢这个畜生。(Dwyer 1995:177)

(3)唐汪话

a. OV 语序:呢常书哈看寨他常看书。(徐丹 2014:191)

b. VO 语序:我买了个羊我买了只羊。(徐丹 2014:188)

(4)西宁话

a. OV 语序:公安局他啊抓住了公安局把他抓住了。(任碧生 2004:339)

b. VO 语序:公安局抓住了个贼娃子公安局抓住了一个小偷儿。(任碧生 2004:345)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看到,临夏、循化、唐汪、青海方言虽然以OV语序为主,但VO语序依然存在。而VO语序的接受度在不同的方言或变体里是有别的。从已发表的甘沟话和五屯话的材料看,暂未见类似情景。非汉语的例子略去。区域内这些非汉语语言的语序是OV,应该是这些语言固有的语序。而汉语方言或其变体今天呈OV语序,却是语言接触的结果。因为汉语固有语序是VO,所以今天VO语序还有所反映,也不足为怪。可以说整个语言区域的语序趋同,OV是一个共享特征。换句话说,汉语原有的VO语序没有影响非汉语,是非汉语的OV语序被汉语接受并吸收了。

3.2.2 格标记系统

语言区域内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都有格标记系统。这一区域内的汉语及汉语变体都产生了格标记系统,如代词主格、宾格区分明显。除了代词分主格、宾格,格标记基本形成系统,如有宾格标记、从格标记、比较格标记、工具格标记、伴随格标记。这些格标记均为标准汉语所不具备的特殊标记。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格标记分成两大类型。一个类型是主格/宾格标记类型。属于这一类型的语言是东乡话、土族语、保安话、临夏话、循化话、唐汪话、甘沟话、青海(西宁)话、五屯话和撒拉语。安多藏语属于作格/通格类型标记的语言,在甘青语言区域里属于一花独放^⑦。所以区域里的语言虽然都有格标记,但是从语言类型学角度看,实属不同类型。这一区域的汉语方言显然受到了阿尔泰语类型的语言影响,没有一个汉语方言或汉语变体采取安多藏语的格标记类型。另外,工具格和伴随格同形、从格和比较格同形也是这个语言区域内蒙古语族语言的特点^⑧。语言区域内的汉语或汉语变体基本都接受了工具格和伴随格同形这一特征。但是从格比格同形这一特征,不是所有汉语方言及变体都接受的,只有唐汪话和甘

沟话接受了这一形式。我们已经在不同的文章中介绍过(参看徐丹 2011、2014; Peyraube 2015、2017), 这里就只举几个工具格、伴随格同形的例子。

(5) 临夏话

- a. 工具格: 你双手啦绳子哈攥紧 你用双手把绳子攥紧。(《临夏方言》1996:190)
- b. 伴随格: 我你啦兰州浪走 我和你到兰州玩去!(同上 189)

(6) 循化话

- a. 工具格: 先铅笔 la 画上个记号 先用铅笔画个记号。(马树钧 1985:98)
- b. 伴随格: 你先他 la 商量一哈 你先和他商量一下。(同上 98)

(7) 唐汪话

- a. 工具格: 我钢笔拉写哈底 我是用钢笔写的。(徐丹 2014:198)
- b. 伴随格: 你你家老哥拉一搭起 你跟你哥哥一块走。(同上 198)

(8) 甘沟话

- a. 工具格: 水笔俩写, 铅笔俩歪写 用钢笔写, 不要用铅笔写。(杨永龙、张竞婷 2016: 33)
- b. 伴随格: 你阿个俩浪去了啊 你跟谁玩去了?(同上 33)

(9) 西宁话

- a. 工具格: 雷管俩手炸下了 雷管炸坏了手。(任碧生 2004:341)
- b. 伴随格: 娃娃们俩家分下了 和孩子们分家了。(同上 341)

(10) 五屯话

- a. 工具格: gu agu shetek-liangge zhaze da-pe-lio ze-li (Janhunnen 等 2008:60)
那女孩 石头-两个 窗户 打破了 情态助词
那个女孩用石头打破了窗户。
- b. 伴随格: ngu ngu-de tixang-liangge qhi-zhe (同上 60)
我我的弟弟一两个 去着
我和我的弟弟去。

从上述语言的例子可以看出,除了五屯话的工具/伴随格显得特殊,其他语言都用“拉/啦/la/俩”表示。前面已经说过,工具格和伴随格同形是这个区域内蒙古语族语言的特征。安多藏语工具格和作格同形,与其他语言都很不同(见 Xu 2015 的综述表)。上述作者记录例句时的用词可能有所不同,如“拉、啦、la、俩”,“下、哈”(发音都是“哈”),但特征却是完全一致的。从各个学者不同的文章里可以看到,有的例句反映出某语言还在变动之中。如马树钧(1985)记录循化话时,记录了这样两个句子:

循化话

- (11) 你用切刀夔砍,用斧头砍 你别用砍刀砍,用斧头砍。(马树钧 1985:100)
- (12) 用铁锹 la 挖用铁锹挖。(同上 100)

例(11)没有用循化话的工具格 la,而是用了汉语普遍用的形式“用…V”。但例(12)动词“用”和工具格 la 并用。这种混用不同语言表达方式的情况在这一带非常普遍。如青海话虽然有宾格标记“哈”,但与“把字句”共存,有时还同现。临夏话、唐汪话也可“把…”“哈”同现。

青海话

- (13) 狗把肉哈吃了 狗把肉吃了。(Dede 2007:867)

临夏话

(14)我把我的亲人哈想者我想念我的亲人。(王森 1993:193)

唐汪话

(15)他把那个棒哈拿上着他拿起了那根棒子。(徐丹 2014:268)

这些不同方式混用、并用的例子说明这一带语言一直在变动中。有的用法还没有达到完全是某一种语言的类型。这在语言接触的案例中也很常见。现在我们看一下五屯话里的工具格/伴随格“两个”。显而易见,“两个”的语音形式来自汉语,模式来自非汉语。“两个”在五屯话里有双重地位。一个是工具格/伴随格标记,一个仍作为数量词组使用。作为格标记的“两个”,语法化程度很高,比如例(10a)里,女孩用一块石头砸了玻璃,并不是两块石头,但和“两个”并列,并不会发生误解。Li(1985:3331)指出,当“两个”用在名词词组前时,“两个”仍可以用如数量词。这清楚地表明了“两个”来源于汉语,只是模式来自非汉语。

可以说,格标记系统在非汉语里是固有的,在汉语及变体里是后滋生出来的。有的还未完全发育成熟,还有变动,但这一带汉语及变体都有了格标记却是不争的事实。格标记系统是这一带语言区域的另一个显著的语言特征。

3.2.3 名词+与格+有

表达“占有”意义时用“名词+与格+有”的格式,除了临夏话和西宁话,是这个语言区域内的另一个共享特征,汉语和非汉语都共享这一句法特征。普通话或其他汉语方言表达占有意义时,动词“有”就足够了。但在该语言区域内,与格标记是必需的。请看:

(16)东乡话:mini kəwon-də adʒu u-wo。(刘照雄 1981:73)

我儿子—与格 舅舅 没有

我的儿子没有舅舅。

(17)土族语:tendə seer va。(照那斯图 1981:54)

第三人称与格 钱 有

他有钱。

(18)保安话:təadə ser wu。(陈乃雄 1986:266)

第二人称与格 钱 有吗

你有钱吗?

(19)临夏话:(不具有这个语言特征)

我再钱没有。(《临夏方言》1996:203)

(20)循化话:ya 钱没有。(马树钧 1985:97)

ya 是[我+哈]的合音,“哈”是宾格标记。

我没钱。

(21)唐汪话:呢哈三个娃娃。(徐丹,田野调查记录)

他—与格 数量 儿子

他有三个儿子。

(22)甘沟话:你啊榔头有哩吗?(杨永龙、张竞婷 2016:28)

“啊”表示宾格

你有榔头吗?

(23)青海话:(不具有这个语言特征)

你多少钱有俩你有多少钱? (王忠强 1984:20)

(24)五屯话:nga-ha ma liang ge yek. (Janhunen 等 2008:55)

我+宾格-宾格[®]马两个有

我有两匹马。

(25)安多藏语:nga' dpe-cha yod. (Robin, preprint:118)

我+与格书有

我有书。

(26)撒拉语:maṇa avo igi var. (林莲云 1985:36)

第一人称与格 男孩 二

有我有两个男孩。

上面的例子清楚地表明,这个语言区域内,表达占有义时需要用与格,这是一个共同的句法限制。临夏方言和青海方言暂未见到类似记录。显而易见,这个特征不是汉语的句法特征,是非汉语影响了汉语,并把这一句法特征植入了汉语及汉语变体。

3.2.4 “有”表达“在”

用“有”表达“在”是语言区域内非汉语借入汉语及汉语变体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我们在五屯话和循化话的记录里没有见到这一句法特征。请看几个例子:

(27)东乡话:mini giə ali miəndə uai-nə ? (刘照雄 1981:73)

我的家哪边

有我的家在哪?

(28)土族语:te tərēe va. (照那斯图 1981:54)

他那儿有

他在那儿。

(29)保安话:bū kətə ginə. (陈乃雄 1986:51)

我家没有

我不在家。

(30)临夏话:tciə²⁴³屋里没有吗他不在家吗? (《临夏方言》1996:193)

(31)唐汪话:呢(他)家里有哩他在家。(徐丹,田野调查记录)

(32)甘沟话:我学校里有哩啊我在学校。(杨永龙 2014:240)

(33)青海话:你大大家里有么你爸爸在家吗?(王忠强 1984:21)

西宁话:姨娘家里有俩姨妈在家吗?(任碧生 2004:341)

(34)安多藏语:nga yu-na me. (Robin, preprint:247)

我家一位格没有

我不在家。

(35)撒拉语:mi(ni_vi) aba-m oj-de vara. (林莲云 1985:84)

我的父亲-我家一位格有/在

我的父亲在家。

上面介绍了甘青一带语言区域内的几个特征,其他特征还有一些,比如,这一语言区域内的语言(循化话不详),复数标记既可用于具有[+生命]名词,又可用于无生命、甚至抽象的名词,这与标准汉语是大相径庭的。如临夏话可以说“教室里的凳子们一呱搬过”(《临夏方言》,

156 页),唐汪话可以说“凳子木阿他放寨”(把凳子放在那儿。徐丹 2011:13),西宁话可以说“黄瓜们买上点去!”(去买点儿黄瓜什么的!任碧生 2004:339),青海话可以说“你说哈的话们实话太难听”(你说的那些话实在太难听。李克郁 1987:27),甘沟话可以说“冰们冻下着哩”(结了冰。杨永龙 2014:240),五屯话可以说“lhankang-dera”(lhankang: 寺庙; dera: 复数标记),Janhunnen 等 2008:105)。

还有一些语言特征在这一区域内广泛使用。比如,区域内的语言除了安多藏语和撒拉语,都吸收了蒙古语族诸语的后缀 tala/thala(直到),都有连接句子的连接词“着/者”等,即这一语言区域内的句子结构都常用“着”连接两个动词词组。部分“V 着 V”与标准汉语表面结构相同,但意义不完全相同。再有,这一语言区域的引语动词“说”均放在句子末尾,标准汉语的“说”类动词只能放在引语前面,这点也完全不同于其他汉语方言。下面,我们用一个总表(表一)概括了这一语言区域内的共享特征。

表一 甘青语言区域内共享的句法特征

	东乡	土	保安	临夏	循化	唐汪	甘沟	青海	五屯	安多	撒拉
OV 语序	+	+	+	+	+	+	+	+	+	+	+
VO 可接受	-	-	-	+	+	+	-	+	?	-	-
有格标记	+	+	+	+	+	+	+	+	+	+	+
主格宾格类型	+	+	+	+	+	+	+	+	+	-	+
作格通格类型	-	-	-	-	-	-	-	-	-	+	-
与格位格同形	+	+	+	-	-	-	-	-	-	+	-
工具/伴随格同形	+	+	+	+	+	+	+	+	+	-	+
从格比格同形	+	+	+	-	-	+	+	-	-	-	+
名词+与格+有	+	+	+	-	+	+	+	-	+	+	+
复数可标记无生	+	+	+	+	?	+	+	+	+	+	+
用后缀 tala/thala	+	+	+	+	+	+	+	+	+	-	-
“有”表达“在”	+	+	+	+	-	+	+	+	?	+	+
连接词	+	+	+	+	+	+	+	+	+	+	?
句子+说	+	+	+	+	+	+	+	+	+	+	+

当然,这一语言区域内的共享特征不止表中列举的特征,但这些事实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这一区域内的汉语方言和汉语变体的声调系统都发生了简化,如三声调、二声调的语言都出现在这一区域,而汉语大部分方言区都是四声调甚至多声调的状况。区域内汉语方言及其变体在语音上也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前后鼻音不分,t遇到细音会腭化,有的地方没有儿化音,塞音摩擦强度大,等等。这些特征虽然不是所有汉语方言或变体都共享的,但却是几个语言共享而不是孤立的现象。许多前贤均有论述,此处不赘。

四 甘青一带语言区域的历史层次

甘青地区一直是历史比较复杂的地区,因为各个非汉人群都在此谱写过历史。语言和人

群都比较复杂。厘清这个地方的语言和人群的关系实属不易。我们在上一节看到了这个地区目前的语言状况,历史上的语言状况如何,还需要不同领域的研究协同进行才能看得更清楚。即便是语言方面,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因为许多地区的语言描写和研究还不充分,还需要相当艰苦的努力才有可能略知一二。

如同世界范围内其他著名的语言区域,甘青一带的语言区域也很复杂。Thomason (2001) 曾提到两个著名的语言区域,巴尔干语言区域(the Balkan)和波罗的海语言区域(the Baltic),第一个区域除了土耳其方言,几乎所有语言都是印欧语系的语言;第二个区域的语言有乌拉尔语系、印欧语系和斯拉夫语系的语言。甘青一带的语言包括汉藏语系的语言,阿尔泰类型的语言,后者主要包括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的语言。上述这些语言区域共享的语言特征很不相同,相同的是各个语言区域不论语言多么繁多复杂,都呈现强烈的趋同现象。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如果只从语言学方面论证,就会出现偏颇。

Janhunen (2006:261)曾指出,这一带语言区域可分为三个层次。最深层是阿尔泰类型的语言,第二层即中间一层是藏语言,最上面的一层,即时间最短的那层是汉语。他的分层可能是基于今天看到的语言特征的考虑。他(2006:261)认为,“这一语言区域的语言都有阿尔泰类型语言的特性,而汉语和藏语的特征主要呈互补状态的分布”^⑩。对他的这一历史分层,我们持不同的观点。我们认为,首先要重视历史,即甘青一带的移民史,然后结合语言特征,分出历史层次。结合历史学、分子人类学和语言学提供的材料,我们初步认为第一层,即最深层应是藏语,第二层是蒙古语,第三层是汉语。也就是说,藏语在甘青一带曾经是占优势的语言,后来是蒙古语占优势,最后是汉语占优势。但该分层不能绝对化,从微观的地域看,出于宗教原因,常常可看到在某些语言里,汉语和蒙古语族语言或汉语和藏语的影响几乎平分秋色。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这个语言区域形成的时间不应早于 13 世纪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即成吉思汗的军队从中亚带回大批签军和工匠。在 13 世纪蒙古人旋风般地驰骋在欧亚大陆前,甘青边界一带曾是各个非汉民族表演的政治舞台。如隋唐时期,甘青一带的汉、突厥、吐谷浑、吐蕃、回纥等民族都曾在此地活动过。吐蕃在扩张的过程中灭了吐谷浑,吐谷浑部分融入了吐蕃,部分融入了汉族和其他族群。党项人在宁夏一带崛起的同时,吐蕃唃廝囉家族曾雄踞甘青一带(参见杨建新 2003;秦永章 2005;齐德舜 2010 等)。唃廝囉政权亲宋抗夏(西夏),其后人于 1073 年归宋并被赐赵姓。今天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的唐汪乡,赵姓 Y 染色体的 25.80%具有在藏人中高频的单倍群 D^⑪。如果我们把甘青语言区域开始形成时间分界定在蒙古人 13 世纪占领甘青后的话,那么在这个区域形成初期的底层应该是藏语,而不是蒙古语。换句话说,在蒙古人统领天下之前,甘青一带是吐蕃的大本营。13 世纪是一个分界线,蒙古人“1218 年灭西辽,1227 灭西夏,1234 年灭金,1253 年迫吐蕃归附,1276 年灭南宋,1279 年统一了全国”(秦永章 2005:37)并建立了元朝。东乡族、土族、保安族等都是在这之后形成的。前面已经说过,这些群体是新融生的群体,而东乡语和保安语都是被替换了的语言(Xu & Wen 2017a)。蒙古语在甘青一带占优势应该是 13 世纪以后的事情,汉语的影响主要是 20 世纪以后的事情。历史提供的线索,辅以语言特征,是我们把语言分为不同历史层次的重要依据。

这个语言区域真正形成是在 13 世纪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后。东乡族、保安族、土族、撒拉族等群体都是在这之后逐渐和不同人群混合而形成的。东乡、保安、撒拉主体人群都是从中亚移民过来的,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些人群形成时间约在 14~16 世纪之间(牟一之 1981;周伟洲 2003;秦永章 2005 等)。此前受到藏语深刻影响的群体,很可能已经同化到藏族人群当中,部

分混合到新来的移民中。这点可以从分子人类学研究的成果看出来。基于复旦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有关甘青一带人群 Y 染色体的样本,文少卿曾做过统计^①,我们看到,在藏人中高频的 Y 染单倍群 D^② 在土族人群中占到将近 15%,在保安人群中占 6.25%,在东乡人群中占 4.67%。在蒙古人群中高频的 Y 染单倍群 C 在土族中占 9%,在保安人群中约占 9.4%,在东乡人群中占 6.5%。融入这些群体的东亚人群的比例普遍很高(Xu & Wen 2017a),而中亚人群的比例在东乡、保安人群里和东亚人群的比例几乎势均力敌,撒拉族群里中亚、西亚比例高达 49.26%。这些统计说明,没有一个群体是单纯的群体,这些群体都是在不同历史阶段混合、融合的群体。由于这部分讲非汉语的人群是从 13 世纪以后移民而来的,所以,藏族和蒙古族高频的 Y 染单倍群的统计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线索。这意味着,这些移民群体来到甘青的时候,藏语已经失去了优势语言的地位,蒙古语应是当时的优势语言。所以今天反映出来的句法特征,蒙古语族语言的句法特征显然占优势。当然这是从宏观的角度看到的情况。从微观的角度看,五屯话里的藏语句法特征比比皆是,而蒙古语的句法特征就相对较少。汉人在历史上有过几次重大的移民运动,一般都是通过屯田、戍边实现的。我们除了唐汪汉民的 Y 染基因测试统计外,目前还没有甘青一带其他地方汉民的基因测试数据。

今天看到的甘青区域性特征,藏语的句法特征较之蒙古语族语言的句法特征显得更呈“点状”,而蒙古语族的句法特征呈“片状”^③。从地理环境看,只有五屯一个语言点表现出较多的安多藏语的句法特点,如比较格标记来自藏语的“看”,有丰富的情态范畴(主观/客观,自主/非自主,推测/事实,传信等范畴)。但是在格标记类型上,五屯话却没有选用藏语的作格/通格标记类型,而是采用了蒙古语族语言的主格/宾格标记类型。再看这一区域的其他语言,西宁、临夏、唐汪、甘沟、循化、夏河等地的语言都采用了类似东乡、保安、土等蒙古语族语言的格标记类型。语言特征的数量和语言接触的深度肯定有关联,但不一定呈正比例关系。五屯人群移民的历史约为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陈乃熊 1987:10)。五屯话深受藏语的影响,但同时也受到了蒙古语言的影响。上述其他语言却都受到了蒙古语族语言的影响,基本连成一片。

五 余 论

本文对中国境内语言区域的研究只是一个尝试。甘青一带的语言区域对语言类型学有重大的意义。目前对语言区域的研究多限于中国境外的语言区域研究,由于甘青一带历史复杂,种族多样,语言的语系、语族丰富,但缺乏深入的研究,所以一直没有被横向考察过。我们这篇文章只是抛砖引玉,提出问题供大家思考。像其他语言区域一样,甘青一带的语言区域价值很高,还有待于语言学工作者结合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进一步的挖掘和探讨。

附 注

①但 Enfield (2005) 的文章没有包括在内。

②循化话的材料来自尹龙(1985)、马树钧(1985)及 Dywer(1995)。尹龙和马树钧在 1985 年的文章里就看到了循化话有变格的现象。

③唐汪话和五屯话是汉语方言的变体,但五屯话已经发展到“混合语”的地步,唐汪话暂时还未成为混合语。详见徐丹(2018)关于混合语讨论的文章。

④语言区域内的许多语言还缺少研究材料。这是以后要做的工作。

⑤详见徐丹(2018)关于词汇借贷和句法借贷不同影响的文章。

⑥关于“阿尔泰语系”的争论很大,有的认为是同源关系,有的认为是类型上相近。我们暂且不予讨论。

“阿尔泰语类型”包括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和通古斯语族。甘青一带主要受到了蒙古语族语言的影响。

⑦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的倒话吸收了藏语的作格/通格类型,请看意西微萨·阿错的《倒话研究》(2004)。

⑧ 区域外的蒙古语族语言从格和比较格同形,但是工具格和伴随格不同形。

⑨ 五屯话第一人称单数主格的形式是 ngu,nga 是与格/宾格形式,这里 nga 已经标记与格了,但又加上了宾格标记 ha。这种过度标记的现象在唐汪话(徐丹 2014:227)里也有。如:“呢(他)va(我和哈的合音)哈(宾格)打给料一顿。”(他打了我一顿)。王森(1993:192)记录的临夏话也有这个现象。如:“你东西哈我[ŋa]哈还给!”这里,ŋa 已经是“我”的宾格形式,但仍然加上了宾格标记“哈”。

⑩ 原文是:“Altaic features are present in all languages of the region while the Sinitic and Bodic features are mainly in a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s.”

⑪ 参见 Xu and Wen(2017b:97)。

⑫ 详见 Xu Dan and Wen Shaoqing (2017a)。

⑬ Y 染 D 单倍群在东部裕固族中占的比例最大,约为 4.48%。Y 染 C 单倍群在东部裕固族中占 16.3%。

⑭ 这可能是 Janhunen (2006:261) 把蒙古族语言看作是最深层语言的原因。

参考文献

- 陈乃雄 1987 《保安语和蒙古语》,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兰州大学中文系临夏方言调查研究组,甘肃省临夏州文联 1996 《临夏方言》,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 李克郁 1987 《青海汉语中的某些阿尔泰语言成分》,《民族语文》第 3 期。
- 林莲云 1985 《撒拉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刘照雄 1981 《东乡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马树钧 1985 《谈循化话中名词语与其后附语素的组合——准格位范畴》,《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第 2 期。
- 牟一之 1981 《撒拉族的来源和迁徙探实》,《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第 3 期。
- 齐德舜 2010 《唢厮啰家族世系史》,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秦永章 2005 《甘宁青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任碧生 2004 《西宁方言的前置宾语句》,《方言》第 4 期。
- 王 森 1993 《甘肃临夏方言的两种语序》,《方言》第 3 期。
- 王忠强 1984 《谈谈青海方言的特殊语序》,《青海社会科学》第 3 期。
- 吴安其 2004 《语言接触对语言演变的影响》,《民族语文》第 1 期。
- 吴福祥 2017 《从区域语言学到区域类型学》,《民族语文》第 6 期。
- 徐 丹 2011 《唐汪话的格标记》,《中国语文》第 2 期。
- 徐 丹 2014 《唐汪话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徐 丹 2015 《从借词看西北地区的语言接触》,《民族语文》第 2 期。
- 徐 丹 2018 《中国境内的混合语及语言混合的机制》,《语言战略研究》第 2 期。
- 杨永龙、张竞婷 2016 《青海民和甘沟话的格标记系统》,《民族语文》第 5 期。
- 杨永龙 2014 《青海民和甘沟话的多功能格标记“哈”》,《方言》第 3 期。
- 杨建新 2003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北京:民族出版社。
- 尹 龙 1985 《循化话中人称代词的变格范畴》,《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第 4 期。
- 意西微萨·阿错 2004 《倒话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张家村志》编修组 2004 《张家村志》,兰州:甘肃鑫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照那斯图 1981 《土族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钟进文 2007 《甘青地区特有民族语言文化的区域特征》,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中岛幹起 1992 《甘肃汉语方言的特点——关于夏河(拉卜楞)话的语言接触》,《中国境内语言暨语言学》第1辑。
- 周伟洲 2003 《古代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与变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期。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1. Areal diffusion, genetic inheritance, and problems of subgrouping: A north Arawak case study. In Alexandra Y. Aikhenvald and R. M. W. Dixon (eds), *Areal diffusion and genetic inheritance: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167-19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and R. M. W. Dixon. 1998. Evidentials and areal typology: A case study from Amazonia. *Language Sciences* 3:241-57.
- Brown, Cecil H., Eric W. Holman and Søren Wichmann. 2013. Sound correspondences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Language* 1:4-29.
- Campbell, Lyle. 2006. Areal linguistics: A closer scrutiny. In Y. Matras, A. McMahon and N. Vincent, *Linguistic Areas: Convergence in Historical and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1-31.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Comrie, Bernard. 1981.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London: Basic Blackwell.
- Dryer, Matthew S. 1992. The Greenbergian word order correlations. *Language* 1: 81-138.
- Dwyer, Arienne M. 1995. From the Northwest China Sprachbund: Xúnhuà Chinese dialect data *The Yuen Ren Society treasury of Chinese dialect data* 1:143-182.
- Emeneau, Murray B. 1965. India and historical grammar. In Murray B. Emeneau and Anwar S. Dil (eds.), *India and Linguistic Areas*. 25-75. Ammamalai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 Enfield, N. J. 2005. Areal Linguistics and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4:181-206.
- Greenberg, J. H. 1963.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In Greenberg J. H. (eds.), *Universals of Languages*. 73-112.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Greenhill, Simon J. et al. 2017. Evolutionary dynamics of language systems. *PNAS*, 1-8.
- Janhunen, Juha. 2006. Sinitic and non-Sinitic phonology in the languages of Amdo Qinghai. *Studies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261-268. Oslo: Hermes Academic Publishing.
- Janhunen, Juha. 2007. Typological interaction in the Qinghai linguistic complex. *Studia Orientalia*. 101: 85-102.
- Janhunen, Juha. 2012. On the hierarchy of structural convergence in the Amdo Sprachbund. In P. Suihkonen, B. Comrie and V. Solovyev (eds.), *Argument structure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s: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177-19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Janhunen, Juha, Marja Peltomaa, Erika Sandman and Xiawu Dongzhou. 2008. *Wutun*. Muenchen: Lincom Europa.
- Keith, Dade. 2007. The origin of the anti-ergative [xa] in Huangshui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8 (4): 863-881.
- Li, Charles N. 1985. Contact-induced semantic change and innovation. In Jacek Fisiak (eds.), *Historical semantics, historical word-formation*. 325-337. Berlin/New York/Amsterdam: Mouton.
- Nugteren, Hans and Marti Roos. 2006. Prolegomena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Western Yugur. In Marcel Erdal and Irina Nevskaya (eds.), *Exploring the Eastern Frontiers of Turkic*. (Turcologica 60). 99-130.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 Pagel et al. 2013. Ultraconserved words point to deep language ancestry across Eurasia. *PNAS*. 1-6.
- Peyraube, Alain. 1996. Recent Issues i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In C.-T. James Huang and Y.-H. Audrey Li (eds.), *New Horizon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161-213.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Peyraube, Alain. 2015.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ase system in some Northwestern Sinitic languages. In Cao Guangshun, Redouane Djamouri and Alain Peyraube (eds.), *Language in Contact in North China—Historical and Synchronic Studies*. 191-215. Paris; 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 Peyraube, Alain. 2017. The case system in three Sinitic languages of the Qinghai-Gansu linguistic area. In Xu Dan and Li Hui (eds.), *Language and Gene in Northwestern China*. 121-139.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 Peyraube, Alain. 2018. On some endangered Sinitic languages spoken in Northwestern China, *European Review* 26(1): 130-146.
- Robin, Françoise. (Preprint) *Parlons Amdo*. (to appear by L'Harmattan).
- Slater, Keith W. 2003. *A Grammar of Mangghuer: A Mongolic language of China's Qinghai-Gansu Sprachbu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 Starostin, Sergei. 2000. Comparative-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lexicostatistics. In Renfrew *et al.* (eds.) *Time Depth i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223-259.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xford Publishing Press.
- Thomason, Sarah G. 2001. *Language contact—An Introduction*.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Thomason, Sarah G. and Terrence Kaufman. 1988. *Language Contact, Creolization, and Genetic Linguistics*. Berkeley/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rubetzkoy, Nikolai S. 1928. Proposition 16. *Act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nguistics*, 17-18. Leiden.
- Velten, Harry V. 1943. The Nez Perce Verb. *Pacific Northwest Quarterly*. vol. 34, 271-292.
- Weinreich, Uriel. 1953. *Languages in Contact; Findings and Problems*. The Hague; Mouton de Gruyter.
- Wichmann, Søren and Eric W. Holman. 2009. *Temporal Stability of Linguistic Typological Features*. Munich; Lincom Europa.
- Wichmann, Søren, Eric W. Holman and Cecil H. Brown. 2016. (eds.), *The ASJP Database* (version 17).
- Xu, Dan. 2015. Sinitic languages of Northwest China; Where did their case marking come from? In Cao Guangshun, Redouane Djamouri and Alain Peyraube (eds.), *Language in contact in North China—Historical and synchronic studies*. 217-243. Paris; 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 Xu, Dan. 2017. *The Tangwang Language: An Interdisciplinary Case Study in Northwest China*. Cham; Springer.
- Xu, Dan and Shaoqing Wen. 2017a. The Silk Road; Languages and population admixture and replacement. In Xu Dan and Li Hui (eds.), *Language and Gene in Northwestern China*. 55-78.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 Xu, Dan and Shaoqing Wen. 2017b. Formation of a “mixed language” in Northwest China; The case of Tangwang. In Xu Dan and Li Hui (eds.), *Language and Gene in Northwestern China*. 87-105.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徐 丹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东亚语言所;
贝罗贝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东亚语言所/法国高等社会学院)

HANYU XUEBAO

CHINESE LINGUISTICS

August 2018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Xu, Dan & Peyraube, Linguistic Area of Gansu-Qinghai in China

The concept of linguistic area has been developed due to linguistic contact research. Some linguistic areas in the world are quite famous while the Gansu-Qinghai linguistic area remains understudied. The present article aims at presenting and analyzing the common syntactic features shared by different languages in this area and its historical layers. The linguistic data show that the Gansu-Qinghai linguistic area has been established. At the lexical level the local Sinitic languages have influenced non-Sinitic languages in this area, while at the syntactic level non-Sinitic languages have impacted Sinitic languages in a more profound and irreversible manner.

Key words: linguistic area, language contact, syntactic features, historical layers

Ma, Ruiying, Dialect Contact and Entering Tone Character Variations in Jian'ou Dialect

The article discusses entering tone character variations in two literature on Jian'ou dialect in northern Fujian province. The article focuses on variations of middle ancient entering final, variations of middle ancient Yin rhyme character, and variations of middle ancient Yang rhyme character in entering tone characters in Jian'ou dialect in Qing Dynasty.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variations in entering tone characters of Jian'ou dialect in Qing Dynasty resulted from internally-motivated change and external language contact.

Key words: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inan dialect literature in English, historical comparison, language contact

Wang, Jian, On the Phenomenon of “*Zhe* (着)” and “*Le* (了)” Alternative in Dialects Spoken in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In some languages or dialects the aspects of perfective and durative share one marker, which is called “*zhe* (着)” and “*le* (了)” alternative by Xing (1979). This phenomenon can be found in Jianghuai Mandarin, Hui, Wu and Gan dialects spoken in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which can be taken as an areal feature of dialects in this area. Based on the description, we put forward the mechanisms and process of the diffusion of the areal feature.

Key words: the dialects in southern Anhui, “*zhe* (着)” and “*le* (了)” alternative, perfective aspect, durative aspect

Wang, Tongshang & Shi, Yuzhi,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from “Taste” verb to Experiential Marker durative in Chinese

It is cross-linguistically true that the “taste” verb has been grammaticalized into an experiential marker in different languages, showing a typological regularity. The “taste” verb “*cháng* (尝)” in Archaic Chinese went through the same development, and it became an experiential marker in the early texts. More importantly, “*cháng* (尝)” disappeared around the 8th century, and “*céng* (曾)”, the phonetic variation of “*cháng* (尝)”, came into the